

A Bird's Eye View of the Oriental History

Histoire de l'Est à vol d'oiseau

東洋史鳥瞰

Chen Qiang

陳 強

Received 24 January 2006 ; accepted 20 May 2006

Abstract Similar to the mankind, civilizations also occur and develop by certain life cycle. In the process of rationality growth, the Indian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s melt the outside experience material continuously with their profound spiritual potential and gave rise to two great “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 thus renewing the original net of meaning. Just as Upanisad rules that Buddhism concerns how to set soul free, classical statecraft culture also rules that Chinese thinker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political order.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ir great spiritual masters, the two civilization grew up from the childhood and obtained their adult forms—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Mahayana Buddhism as the crystal of the Indian “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 spread toward faraway east along the “Silk Road” and collided with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ch also experienced the similar “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 as the result, the latter’s gene was changed forever.

Keywords: philosophical break through, cultural gene, Buddhism, Confucianism, Mahayana Buddhism, statecraft culture, Neo-Confucianism

Résumé Les grandes civilisations, comme le développement de l’humanité, ont leur propre cycle vital de la naissance au vieillissement. Dans le processus de développement rationnel, les civilisations indienne et chinoise constituent deux grandes « percées philosophiques » dans l’histoire de la pensée grâce à leur renouvellement constant avec le temps. De même que Upanisad définit l’attention que le bouddhisme prête à la délivrance de l’âme de l’individu, la culture royale et officielle décide aussi la poursuite de l’ordre politique parfait par les différentes écoles de pensées de l’époque pré-Qin. Ces deux grandes civilisations ont réussi à accomplir leur développement spirituel et atteint l’état de maturité—le bouddhisme et le confucianisme. Le bouddhisme de grand Cheng hautement philosophique, en tant que la cristallisation du développement rationnel de la civilisation, a été diffusé vers l’Est lointain le long de la Route de la Soie et assimilé par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qui avait connu elle-même une percée philosophique, et a modifié ainsi à jamais le gène intérieur de la civilisation de la Chine.

Mots-clés: percée philosophique, gène culturel, bouddhisme, confucianisme, bouddhisme de grand Cheng, culture royale et officielle, philosophie néo-confucianiste des dynasties Song et Ming

摘 要 各大文明也和人類一樣有著發生發育以至衰老的生命週期。在理性發育的過程中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以其深刻而豐富的意蘊不斷融化經驗材料，更新其原有的意義之網，從而形成思想史上兩次偉大的“哲學突破”。正如《奧義書》規定了佛學對個人靈魂解脫的關注，王官文化也規定了諸子百家對完美的政治秩序的追求。兩大文明在其偉大的精神導師那裏順利地完成了心智發育，從而獲得了自己的成年形態——佛教與儒教。高度哲理化的大乘佛學作為印度文明理性發育之結晶則沿著“絲綢之路”傳向遙遠的東方，為同樣發生過“哲學突破”的中國文明所消化，從而永遠地改變了後者的內在基因。

關鍵詞: 哲學突破；文化基因；佛教；儒教；大乘佛學；王官文化；宋明理學

偉大的文明和文化乃是宇宙生命進化之流在達于終點之時所孕育的較高等動物更高一級的生命形態。而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在生命進化的長河上只能視為高等動物與文化生命二者之間的過渡橋樑——他的肉身屬於前者而其靈魂則可與後者融為一體。這神秘莫測的文化生命有其獨立的意志和意識，它如同一位傀儡戲的表演者總是以其無形之手指使千百萬受其化育的人類思慮、行動，從而演出一幕又一幕波瀾壯闊的歷史運動：一句話，所謂“人類的歷史”究其實乃是各個獨立的文化生命發生、發育的經歷。文化生命因其須以人身為依託，故而也和人類一樣有著始、壯、究的生命週期——而其中發生過“哲學突破”的甚至也和人類一樣需要在竭思盡慮的理智狀態與思惟斷滅的休眠狀態之間交替輪回。

各大文明在其發生之初無不顯現為布克哈特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一書中所描述的一層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見編織而成的共同的紗幕，正是這圓足的意義之網泯滅了“我”與“你”和“他”之間的區別。當此之時，童真未泯之“我”完全融化在和諧無間的公社或氏族之中——後世高度發展的禮樂刑政在人類的自我意識尚未發育之際自是毫無用武之地。與此童年期文化心理相適應的是淳樸的民俗、簡單的習慣法以及以氏族集團為基礎的帶有濃厚的部落民主色彩的城邦。而若發生部族與部族之間的長期的戰爭則往往導致軍事首領的個人權力的急劇增長，最終形成跨越廣大地域的專制集權的封建國家——正是籍此權力運作機制處於迅速擴張時期的征服氏族得以有效地加強本集團內部的凝聚力並進而鞏固其對被征服地區的統治。從世界歷史上看，大致處於此期文化形態的主要的原生文明有前王朝時代的埃及文明、蘇美爾時代的兩河文明，後期吠陀時代的印度文明、唐虞三代的中國文明、城邦時代早期的希臘文明、中世紀“黑暗時代”的基督教文明、倭馬亞時代的伊斯蘭文明，而古代美洲諸文明則從未超出這一發展階段。而當文化生命開始其心智發育之時，日積月累的外在聞見便不斷撕破那層童話般的紗幕，使主體獲得日益清晰的現實感，從而證知自身乃是特定時空之中的肉身我——由此而生私有制關係。原本融洽無間的公社和氏族終因其成員之自我意識的成長而趨於崩解，而體現純粹自由的文化生命則相應地由隱而顯，開始變現嚴密的法律

條令以及強大的國家機器以凝聚日漸異化的文明成員——此即由單獨的個人所組成的官僚制國家之緣起。而當文化生命之潛能開始耗竭之時，其所孕育的政治法律制度亦無可挽回地隨之趨於沒落。步入此期文化型態的主要原生文明有古王國時代的埃及文明、古巴比倫王國時代的兩河文明、列國時代的印度文明、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文明、伯裏克利時代的希臘文明、阿拔斯時代的伊斯蘭文明、文藝復興時代的天主教文明以及啟蒙時代的新教文明。

埃及文明和兩河文明在理性發育的過程中隨著凝聚其文明成員的那層紗幕的幻滅走到了自己的末路，而印度文明、中國文明、希臘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則以深刻而豐富的意蘊不斷融化經驗材料，更新其原有的意義之網，從而形成思想史上四次偉大的“哲學突破”。在這四大文明的最初的紗幕裏面就已經確立了後來各自的“哲學突破”的方向——正如《奧義書》規定了佛學對個人靈魂解脫的關注，王官文化也規定了諸子百家對完美的政治秩序的追求；雅典哲人所構造的“理念世界”使人聯想古代神話中的奧林匹斯山神系，而在基督教神學那裏則可尋到近代西方哲學的前身。希臘人熱中于如何圓滿地解釋世界，古典文明終因在理性發育之後沒有形成直指本心的高級宗教而失去其凝聚力，而基督教文明在近代發生的“哲學突破”似乎正在重蹈希臘文明的前車之覆。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在其偉大的精神導師那裏順利地完成了心智發育，從而獲得了自己的成年形態——佛教與儒教。

延綿至今的印度文明作為獨立的文化生命是在自西北印入侵次大陸的雅利安文化與當地土著文化長期融合的基礎上形成的。從後來的佛學思想史上看，發端于南印的般若經系和中觀學說體現了典型的長於妙悟神解的東方思維，而源于雅利安人聚居之西北印的小乘有部和大乘有宗的學說則近於注重分析論證的西方哲學——此其所以空、有二宗在東漸之後一榮一枯。與注重歷史和經驗的中國文明不同，印度文明從一開始即視流變不定的經驗世界為幻有，它永遠都在追求著與永恆的宇宙本根梵天融為一體從而超脫輪回之苦的不可言說的意境。因其蔑視經驗故而得以永葆童真——這大約就是印度的種姓制度恒久不變的根本原因。早在西元前六世紀，這個偉大的文明即以《奧義書》梵我合一的思想為起點開始了長

達一千五百餘年的哲學繁榮——所謂“九十六道並欲超生”。在漫長的心智發育的過程中，由外在聞見形成的理性以自身為依據不斷否定原有的價值和觀念，而生機未竭的文明則以其內在的潛能融化經驗材料從而編織更為成熟的意義之網——兩種趨勢相反相成，前者顯現為以順世論為代表的粗俗的唯物主義思想，後者則孕育了作為印度教在理性時代之高級形態的佛教。原始佛教以眾生平等的教義反對種姓制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東北印土著民族與雅利安族之間的矛盾——但與其母體印度教始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當日益成熟的心智再也無法接受原始宗教不證自明的教義之時，釋迦即從探索人生痛苦的根源著手揭示更為合乎理性的靈魂解脫之道（四諦之中的集諦即為佛教的理性時代的烙印）。原始佛教的三法印以“諸法無我”印最為核心——對此印的不同詮釋構成小乘佛學與大乘佛學的根本歧異：前者傾向以現象對待的方法空去外面的肉身我，而後者則通過遮撥現象的空觀泯滅遍計所執的先驗自我。由小乘而大乘，由空宗而有宗，印度佛學直到最終仍然是《奧義書》梵我合一說的更為周密精微的表述。

印度文明的理性成長除了孕育佛教還引發社會生活領域的一系列深遠的變化，象市民社會的發育、工商業的繁榮、私有產權的確立以及官僚制帝國的崛起等等——比較而言思想領域的變化最為顯著地反映了文化生命的深層律動。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其他各大文明的世俗化的進程之中。借用佛學的術語來說，所有這些現象相對而言皆是伴生的互為依託的增上緣，而沒有任何一方可以作為決定它方的直接的因緣。正是在充分的理性發育的基礎上才出現了象孔雀帝國和笈多帝國這樣高度集權的官僚制國家——帶有創始性質的孔雀帝國也和秦漢帝國一樣以嚴刑峻法著稱，這是因為此時文化生命需要凝聚其全部的精力方能克服由長期的列國紛爭狀態之余勢所形成的巨大的離心力。西元九世紀當次大陸的佛教在伊斯蘭教東漸的壓力下日趨衰亡而印度教在其本土再度興起之時，這個沉湎於夢幻之中的文明因為逐漸喪失對其理性發育過程的記憶終於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時代。此後，印度文明再也無力生長出象孔雀帝國和笈多帝國這樣的大一統國家——後起的莫臥兒帝國究其實僅是伊斯蘭民族所建立的征服帝國。而高度哲理化的大乘佛學作為這

次理性發育之結晶則沿著“絲綢之路”傳向遙遠的東方，為同樣發生過“哲學突破”的中國文明所消化，從而永遠地改變了後者的內在基因。

中國文明的源頭並非今日田野考古所發掘的某個文化的城址，而是標誌著文化生命開始達於自我意識的《詩經》和《尚書》——在以後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亞洲東部無數的種族在文明所散發的熱力輻射之下逐漸融入以此為起點的延綿不絕的記憶之中。經典記載即便與考古發現相抵牾亦無損其對記憶而言的真實性，這就好像童年時代溫馨的回憶較當時具體的情形更為真切的道理一樣。《詩》、《書》所蘊涵的虔敬肅穆的文化氛圍將我們帶到了殖民城邦眾星拱月般藩屏王室的西周封建時代。當周人開始營建其殖民帝國的時候，他們也和初至美洲的西班牙人一樣以“王”的名義佔有廣大的土地，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種性質的“佔有”實僅表示政治上的轄權。而在帝國的基層，農村公社的農民在井田制之下如同一個大家庭的成員共同使用耕地——在土地的法權關係確立之前亦無所謂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問題。彼時周族成員及其盟友作為征服氏族居於國內統治廣土眾民，而在城邦之外的是生活於農村公社中的沒有開化的“野人”——後者因未受文化的濡染永遠存在於滄桑的歷史流程之外。當此之際，童稚的個人尚未從群體中分化出來，故而國家主要與氏族或公社直接發生關係。和所有的童年期文明一樣，宗教信仰在上古中國的社會生活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傾向政教合一的王官文化賦予國家政權以教化人民的義務，由此孕育了象文、武、周公這樣亦君亦師的偉大的聖王。在國命天授觀流行的西周盛世，各級統治者深信人格化的上帝永遠居高聽卑——唯有敬畏天命，始終謹慎地行使權力，才能在變幻莫測的時勢中自求多福。正是以童稚無邪的人性為基石確立了等級森嚴的偉大的禮樂制度。而在兩千八百年前的幽厲時代，古代世界的上帝就隨著中國文明的心智發育被迫“退隱”，由此引發春秋戰國以至秦漢之際五百餘年的政治動亂。在歷史的陣痛中，與原始的天帝崇拜相適應的封建制度土崩瓦解，近代意義的民族國家則在戰國時代呱呱問世。信仰危機引發歷史上最早的哲學繁榮——諸子紛紛起而創說，不懈地探索可以折服日益成長的理性的天道性理；而直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時，這場掀翻天地的偉大的宗

教革命終於塵埃底定。

中國文明因為儒學創始人孔子出現于世順利地度過了自己的童年時代：在“六藝”的思想系統中，周人所尊奉的人格化的“天”一變而為《易傳》中健行不息的生命進化之流，從而再也不會隨著理性的成長而“退隱”；在世卿世祿的封建制度棟折榱崩的時候，《周禮》規劃了一幅選賢與能的官僚制國家的藍圖以取而代之；而作為儒家的“經王”，《春秋經》則在究天人之際的基礎上闡發撥亂反正、漸趨大同的全新的王官之學。當孔子攜其弟子棲棲惶惶、奔走列國之際，新生的文明開始表達其重建政治秩序的強烈的意願——正是由於這意願的驅使，尊奉“素王”的儒家在戰國初年逐漸控制魯、魏等國並進而在大一統時代征服秦漢帝國。只有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我們才能準確地把握子夏與魏文侯、子思與魯穆公、孟子與梁惠王、呂不韋與秦王政、孔甲與陳涉、董仲舒與漢武帝、王莽與漢室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正是以新經學“據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的學說為指導爆發了戰國初年遍及各國的變法運動——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商鞅變法即為其中最為成功的一次嘗試：甚至連其“燔《詩》、《書》以明法令”的措施亦與孔子“損文用忠”的思想不無關係。這次變法的實質乃是在古代世界的氏族和公社開始崩解的背景下進行的創建由個人組成的近代民族國家的改革——而其起點則是通過土地私有產權的界定直接確立國家與個體農民之間的關係。經過以商鞅變法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凝聚千千萬萬的個人的利維坦終於在大地上站立起來——春秋末年“人與人爭”的原始的自然狀態已一變而為戰國時代“國與國爭”的高級的自然狀態。長期緊張的國際關係使得利維坦內部的成分趨於均勻，加之個人的自我意識隨著文明的理性發育日益成長，三代世侯世卿之遺法終為戰國、秦漢時代的布衣將相之局所取代。在當時社會的基層，傳統的農村公社隨著土地私有產權的確立進一步崩壞，而商業資本運動的結果則形成兩漢時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大土地所有制。原來生活在農村公社蔭庇之下的“野人”在共同體崩解之後有的成為新時代的雇農或自耕農，而那些依然停留在心智發育的童稚階段的則因缺乏自立意識淪為大地主大商人的僮僕奴婢——其人口比重隨著戰國之後文化生命的精力衰竭日益增長。直到傾向眾生平等的

大乘佛學東漸中土，這一局面才因中國文明的內在基因的改變發生根本性的逆轉。

《壇經》裏面有一段五祖弘忍與六祖惠能之間的對話：弘忍問道“汝是嶺南人，又是犬葛獠，若為堪作佛？”惠能則回答說“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犬葛獠身與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弘忍的意見代表的是三代以來世代相延的貴族化的古典中國文明，此時其勢已是強弩之末；而當惠能答話之時，融匯自上而下的王官文化與自下而上的北傳佛學所形成的第二代中國文明正在南方蓬勃興起。古典中國文明在生長出秦漢帝國這樣的超級利維坦之後已因負荷過重而感精疲力竭——這在學術思潮上表現為缺乏思想活力的經學的興起。強大的匈奴的存在使這個超級利維坦仍然可以象戰國七雄那樣將共同體成員的動物性集體向外排泄，從而增強自身的內在凝聚力；而在北方的強敵衰弱之後，秦漢帝國便不得不將其攻擊性向內收斂，這就使得國內的階級矛盾日益加劇。我們知道這個帝國的上層乃是由隨著文明的理性發育從古代世界的氏族和公社中分離出來的個人組成的近代官僚制國家，而其下層則是保留著農村公社之殘餘的鄉里組織——後者隨著文化生命的精力衰竭開始成長為東漢時代大土地所有制之下的莊園。秦漢帝國的上層結構後來隨著作為其賦稅與兵役對象的自耕農之人口比重的銳減趨於崩潰，而居於下層的莊園則因失去大一統國家的蔭庇進一步演變為魏晉南北朝時代帶有軍事性質的塢堡。由此而言，曹操與苻堅統一中國之嘗試的失利貌似偶然卻蘊涵著某種歷史的必然性。在秦漢帝國崩解之後，處於氏族公社階段的北方游牧民族開始象洶湧的海潮一樣一波接一波地入侵中原，而失去融化能力的古典中國文明此時則萎縮為高門士族自矜身份的“家學”——北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倒退回了“哲學突破”發生之前的封建時代。作為這次理性發育之結晶的兩漢經學在解脫了對大一統國家的責任之後開始回到自己的內心，從而恢復了思想的活力——此即飄逸脫略的魏晉玄學。經學乃玄學之醒覺狀態，而玄學則為經學之夢幻狀態。正是以超脫歷史感與現實感的魏晉玄學為依託，古典中國文明開始了消化與之性相略類的大乘佛學的艱巨工程。

比較一下《莊子》與《壇經》我們就會發現雖然二者皆以妙悟神解著稱，但前者似乎更具孤

峭脫俗的貴族氣質而後者則偏向簡易隨和的平民風格——這也是以王官文化為代表的古典中國文明與融匯了大乘佛學之後形成的第二代中國文明之間的分野。正是在新的文化氛圍之下，儒家“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政治理想才落實為鼓勵社會各階層公平競爭的科舉考試制度，而魏晉南北朝時期與土地所有者有著人身依附關係的佃客才演變為兩宋時期作為契約關係中的平等方租賃地主土地的農民——此乃佛教給予中國之恩惠。而從消極的一面講，中國人亦因之深染沉湎個人內心之“印度病”，從而喪失了直面現實的毅力和奮發向上的精神。最後在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革命的烈火中，這個曾經哺育過孫武、商鞅、白起和韓非的文明借助歐洲思潮中極端的唯物主義思想為自己治癒了多年的頑疾，並因而再度煥發了生機和活力。在第二代文明孕育的過程中，南中國和北中國在發育程度上似乎出現了明顯的“斷層”：較為老成的南方流行空靈脫略的玄學與慧學，而較為幼稚的北方則講求嚴謹篤實的禮學與定學——當天台智者鼓吹其“止觀雙修、定慧並重”的學說時，南北文化生命在經歷長期的隔閡之後終於開始合二為一。從後來禪宗內部的能秀之異到廟堂上面的牛李之爭，從晉帖魏碑對書風的影響此漲彼消的經歷到租庸調製漸為兩稅法所取代的過程，我們都可以感覺到南北文化勢力相互之間短兵相接、互爭雄長的緊張——總的說來北方的文化生命隨著自身的理性發育逐漸濡染先進的南方的色調，但其間亦不無象唐代“古文運動”這樣的反動。而若將考察的視野放寬，就不難發現隋唐史學界所關注的“南朝化”的趨勢其實一直延續到後來的宋明時代。與玄學和經學的關係略類，在第二代文明中隋唐佛學乃宋明理學之夢幻狀態，而宋明理學則為隋唐佛學之醒覺狀態。當朱子尖銳地批評釋氏蔑棄綱常之時，新的文化生命終於睜開惺忪的睡眠，從而獲得朦朧的歷史感與現實感。

在中國文明第二次大輪回的過程中又蘊涵著一次與明代相始終的較小的輪回：文化生命在遭遇元末遍及全國的明教起義之後似乎回到較為原始的狀態，並以此為起點開始了一輪新的發育週期。從明代中葉起，隨著文明的理性發育個人的自我意識日益成長，與之相應的是空靈奔放的陽明學逐漸取代嚴謹篤實的朱子學成為學術思潮的主流；而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則帶動了城市的繁

榮，這在文學史上反映為以市民為服務對象的通俗文藝在此時出現了繼宋元之後的第二個高峰——這個小周期終因一六四四年明帝國的覆亡劃上了句號。在經歷滿洲征服的強烈震撼之後，第二代中國文明開始進入長達三百年之久的休眠期——顯現在學術思潮的變遷上就是以“實事求是”為標榜的考證學派的崛起。文化生命的高度成熟使前近代中國除了週期性的易代改朝之外鮮有劇烈的革命運動，與列國紛爭、動亂不止的同時代歐洲社會形成鮮明的對照——也唯其如此這個老大帝國的趨於萎痹的肌體越來越難以適應高度緊張的叢林環境。遇到象甲午戰爭這樣的突發事件之時，中央政府所能調動的只是京畿附近非常有限的兵力——如此情形在全民皆兵、令出如山的戰國、秦漢時代直是不可設想。與位於文明邊緣的日本作一比較即可更好地理解中國所遭遇的困境之實質。十九世紀的日本之所以能夠迅速適應擴張中的西方國家關係體系恰恰由於遲至開國前的江戶時代整個社會結構的發育程度仍然與其母文明的春秋或北朝時期伯仲之間。明治維新不過是日本歷史上的第二次大化改新——後者在七世紀尚未分化的氏族社會的基礎上抄襲官僚制的隋唐國家之架構的嘗試只能證明是勞而無功。從儒學輸入後蛻化為維繫封建制下主從關係之“武士道”的“返祖現象”到內部組織嚴密成員各守分際之工商業集團在經濟競爭中迅速崛起的典型事例都使人感到氏族社會的傳統在一個民族文化心理深層的影響——也正因其社會機制之原始與歐美相去不遠，日本得以由其文化發育之趨勢順利地實現“脫亞入歐”。而古老的中國只有在蛻去第二代文明的僵死的外殼之後才能逆勢退回久違的“戰國時代”——在理學鉅子那裏洋溢著人性之溫暖思想潮流已在時間的流程中凝斂物化為毫無生命力的意識形態。隨著文極而敝的中華帝國之崩解，“理想國”中體現善之理念的“哲王”終於向代表著激情和欲望的階級交出由其長期壟斷的權力——而叢林化的環境則為逐鹿中原的各派政治勢力提供了選舉下一代王者的絕佳場所。

作者簡介: Chen Qiang (陳強), 中國廈門大學哲學系講師。

通信地址: 中國福建省廈門市龍虎山路 458 號 204, 361005。

Chen Qiang, Philosophy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P.R. China.

E-mail: qchenlab@yahoo.com.cn